第一章　绪论

军事方法学是一门关于军事方法的本质、规律及其运用的科学。它既是方法科学的重要分支，又是军事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和战争等军事活动的发展，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逐渐形成了一门有专门研究对象和知识体系的新学科。在新技术革命蓬勃兴起和军事领域不断发生巨大变革的条件下，加强军事方法学的研究，是一项刻不容缓的迫切任务。

第一节　军事方法学的研究对象

作为一门科学，必须有自己的专门研究对象。军事方法学同其它各门学科一样，所要研究的特定对象是明确的，即以研究军事实践与认识活动的方法问题为己任。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必须懂得方法、方法科学的科学涵义，明了军事方法学在方法科学、军事科学中所处的位置，认清军事方法学与其它相近学科的区别、联系。

(一)方法与方法科学

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不仅要解决世界“是什么样”和“为什么这样”的问题,而且还始终存在一个怎样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问题。无论认识什么事物,做什么工作,开展什么活动，人们总要考虑采取怎样的方式、办法才比较恰当，才卓有成效。如思考问题要讲究思想方法，展开工作要讲究工作方法，做领导的离不开领导方法，指挥作战离不开作战方法、指挥方法，组织教学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考虑教学方法，进行科研得考虑科研方法，搞经济要有个经营方法,搞生产要有个管理方法,等等。可以这样说,方法贯穿于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之中，离开了一定的方法，任何人都将一事无成。

那么,方法的确切涵义是什么呢 溯其渊源,“方法”一词最早见于古希腊。英文中的方法“Method”，德文中的方法“Methode”、俄文中的方法“Merog”等,都是从希腊文“μεγα”和“οδος”而来的。“μεγα”和“οδος”,可译为“沿着”和“道路”,表示“通向某事物的途径”的意思。近代欧洲哲学家霍布斯在《论物体》中对此作了强调,认为方法是“采取的最便捷的道路。”另一个哲学家、科学家笛卡尔,同样是把方法比作“遵循正确的道路。”(分别见《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第 65、137 页,商务印书馆 1975 年第 2 版)中国过去也往往把方法叫做“道”,如处世之道、治国之道,“吾未知吴道。”(《左传·定公五年》)等等。

现代人讲的“方法”,同先人的原意既有联系又有所区别,其中最大的区别是“方法”概念的外延有了明显的扩展,对“方法”的内涵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所谓方法，不仅仅指沿着什么途径和道路的问题，而是指人们为了达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所采取的一切方式、途径、程序和手段的总和。例如,要感知一个事物,获取有关的感性材料，就必须通过一定的途径，采取一定的方式和手段，去接触和观察它；要对该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有所认识，就必须运用一定的思维形式去进行分析、研究；而整个认识过程，又必须按照一定的程序和步骤展开，才能比较顺利地完成。改造一个事物同样如此，首先面临从何下手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对行动途径的选择问题；怎样去做、去行动才能达到目的呢？又必须解决通过那些方式和手段，沿着什么样的程序、步骤展开才比较恰当的问题。总之，无论认识世界的方法，还是改造世界的方法，途径和程序无疑很重要，但行动的方式和采取的手段同样是必不可少的内容。

对“方法”性质的理解,至今人们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在这些

众多的看法中,黑格尔有段话得到了不少人的赞同,他说“:在探索的认识中，方法也同样被列为工具，是站在主观方面的手段，主观方面通过它而与客体相关。……在真的认识中则正相反，方法不仅仅是一堆规定，而且是概念的自在自为地被规定，概念之所以是中项，只是因为它同样也具有客观东西的意义。”(《逻辑学》下卷第532～533 页,商务印书馆 1976 年版）其意思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方面，方法是主观联系客观的工具和手段，通过这个工具和手段可以获得关于客观方面的经验材料；另一方面，方法使主观能运用已有的知识概念对经验材料进行思维加工，从而获得关于客观的真理性认识。作为一个认识过程，黑格尔对方法实质的理解无疑是正确的。一些人由此把方法引申为“思维的形式”、“认识的中间环节”“研究和认识的途径”“对形式的认识”等等,在一定意义上也都是对的。但又要看到，方法决不仅仅是指认识世界的方法，它还包括改造世界的方法，即各种各样的行动方法。因此，如果把方法视为主观联系和作用于客观的过程中的行为方式，应该说要贴切得多、全面得多。这种理解,比较准确地反映了方法的实质,不仅可以看出方法是由主体、客体和媒介三者构成的整体，而且更充分显示了方法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当然,方法有唯心的、经验的与科学的之分。像古时采取占卜、求签的方式,获取‘神谕”“仙示”来决定征伐、农事、婚姻之类的重大问题，就是典型的唯心方法；遇到了问题，凭主观猜想和臆测去解释或着手解决，也是一种主观唯心的方法。如果处理问题和事情，完全根据以往处理过同类问题和事情的经验，进行类比得出相应结论和解决办法，那么这种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则是经验的方法。很明显，唯心方法与经验方法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是不是以实践作为基础，唯心方法以脱离社会实践为特征，经验方法以依靠社会实践为特征。不过，经验方法所依据的实践经验有着一定的局限性和表面性，它主要靠事物之间的简单类比作为基础，似乎办一件

事，过去这样做取得了成功，现在或未来照原样去做也必然取得成功，把方法变成了固定不变的模式。科学的方法却不同，不仅与唯心方法背道而驰，而且与经验方法也有着质的区别。科学方法的基础同样是社会实践，同样要重视经验的积累，但它不是直观地、局部地反映实际和被动地适应实践，而是使主体能通过社会实践，认识、把握客观对象的本质联系和发展变化规律，并运用这种正确认识去指导改造客观对象的活动。

显然，关于方法的本质与规律的认识，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需要进行专门的研究。那种专门以“方法”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就是方法科学。如果下个定义，方法科学应是指关于方法的本质、规律及其运用的科学，或者说是关于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切方式、途径、程序和手段的科学知识体系。其根本任务，是在分析研究各种科学方法的性质、内容和作用的基础上，找出这些方法的内在联系和相互间的关系，从而揭示科学方法的共同本质和共同规律，总结和创造各种具有普适性的科学方法，从而引导人们卓有成效地达到认识与改造世界的目的。

值得指出的是，方法科学不可能脱离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而孤立存在，只能随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因此方法科学有一个萌芽、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从公元前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和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到 17 世纪培根的《新工具》和笛卡尔的《方法谈》，再到 19 世纪黑格尔的《逻辑学》和马克思、恩格斯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人类一直在追求对方法的科学认识、解释和创造。不过，方法科学之所以能成为一门科学而自立，还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各国不仅对哲学方法，而且对一般的与具体的科学方法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分不开的。虽不能说目前关于方法的科学知识体系很成熟了，然而它毕竟已经成为人们普遍关注和重视的一门科学。

（二）军事方法学的研究对象

由于军事活动是一种以准备、实施战争为中心的直接相关的社会活动，因此从事这种活动的方法，既同一般社会活动方法有许多的相似之处，又与一般社会活动方法有不少相异的地方。作为以研究一般社会活动方法为己任的方法科学，固然可以对军事活动起到方法上的指导作用，但毕竟不能包括一切，军事活动还需要有体现军事特色的方法科学。军事方法学，就是这种具有军事特色的方法科学，它以研究军事实践与认识活动的方式、途径、程序和手段为对象，旨在建立关于军事方法的本质、规律及其运用的科学知识体系。很显然，军事方法学是方法科学和军事科学相结合的交叉科学，一方面是方法科学的特殊应用领域，另一方面又是军事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军事方法学与方法科学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与一般的关系。一般方法科学，研究的是关于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般活动方法问题，所揭示的方法的本质、规律和运用原则，是包括军事活动方法在内的一切方法的共同性本质、规律和运用原则。因此，其基本原理、原则既适用于人与自然斗争的领域，又适用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领域，无疑也适用于军事活动这个特殊领域。而军事方法学所涉及的范围却相对比较窄，只研究军事实践和认识活动的方法问题，所揭示的军事方法的本质、规律及其运用原则，既有一般方法的共性因素，又有自身的个性因素，因此除了共性因素外，特殊的军事方法通常只适用于特殊的军事活动领域。

这种互相联结而又互相区别的关系告诉我们：一方面，既然一般方法科学所揭示的方法的本质、规律和运用原则，反映了包括军事方法在内的各种方法带普遍性的因素，那么就必须善于运用一般方法科学的原理、原则来指导军事方法学的研究。同时，由于各种特殊活动方法之间都存在着相通的部分，因此还要善于吸取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思维科学等相关领域方法学的营养，把适用于军事领域的东西移植过来，以丰富和发展军事方法学；另一方面，军事方法学既然反映的是军事活动方法的特殊本质、规律及其运用原则，旨在满足军事领域的特殊需要，这就要求人们当运用一般方法科学的原理、原则和移植其它活动方法的适用部分时，一定要密切结合军事活动的具体实际和特殊要求，决不可照搬照套。另外也要看到，军事方法学所获得的新成就、新进展，同样可以为一般方法科学、其它领域方法学提供养分，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新因素，从而促进一般方法科学与其它领域方法学的发展。总之，军事方法学虽然以研究军事方法为对象，但它决不是孤立研究军事方法，就像军事活动是整个社会活动的一个特殊领域一样，军事活动方法也是整个社会活动方法的一个特殊领域。研究对象、领域的相互联系与区别，从根本上决定了军事方法学在一般方法科学中所占有的特殊位置。

军事方法学与军事科学之间，则构成了一种部分与整体、要素与系统的关系。军事科学作为研究战争本质和规律、并用于指导战争准备与实施的知识体系，包含的门类和学科很多。按照以往的分类和构成形式，有的把军事科学分成军事理论科学和军事技术科学两大门类，有的认为军事科学由军事艺术理论、军队建设理论、军事教育理论、军事经济和后勤理论、军事历史和应用科学技术成果等门类组成，还有的将军事科学分为军事思想、军事学术、武装力量建设、军事历史、军事地理、军事技术和其它边缘学科 7 大部分，等等。尔后，再在这些门类下面细分成各种学科。无论怎么个分法，而且各个门类和学科各有各的研究对象，各有各的实践与认识领域，但都面临有一个方法问题。也就是说，军事方法贯穿于军事实践与认识活动的一切领域，每一个门类和学科都必须对有关的方法问题加以研究和总结。

以往，人们多半是在自己关注的专门领域和学科来研究有关

方法问题，如作战、指挥方法和军队建设方法始终是军事理论科学研究的主题部分，武器设计方法和军事试验方法一直是军事技术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等等。但随着现代军事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战争的发展，不仅整个军事科学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思维科学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结合明显加剧，而且军事科学内部的各门类、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结合也日趋强化，这就不能不提出研究军事方法的共同本质、规律和运用原则的要求，军事方法学正是在这种背景和条件下应运而生的。其根本任务不是去研究各个具体的军事领域和学科的专门方法，而着重于研究科学军事方法的共同本质、基本规律、一般类型及其在军事实践与认识活动中的运用。

因此，军事方法学既同军事科学的各个门类、学科紧密相联，要以军事活动的各个领域和各门学科作为自己存在的基础，不断从各种具体的、专门的军事方法中吸取营养，离开了这一切，军事方法学也就成了空中楼阁；同时，军事方法学的研究对象及其所揭示的科学内容，又远远超出了各个具体的军事领域和学科，不能属于其中的那一个部分，只能作为军事科学的新门类、新学科而单独存在。由此可见，军事方法学根植于军事的各个领域和学科，并在此基础上成长为独立之树，可说是现代军事科学体系中的新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外，要明确军事方法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还必须具体弄清它与某些相近学科的联系和区别。毫无疑问，由于军事方法学几乎同方法科学、军事科学的所有门类和学科，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彼此相近的学科也非常之多，因此想逐一地分析这些学科同军事方法学的联系和区别，实在是件十分复杂和困难的事情。然而，就其中主要的、联系最紧的几个相近学科，做点概略性比较还是十分必要的。例如：

哲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自然界、社会和思维，其任务是解决人

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军事哲学，则是从总体上告诉人们如何把握军事世界的军事观及其基本的方法论；

思维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思维的机制和形式，其任务是揭示思维的发生、发展及其基本规律，告诉人们如何正确地进行思维。而专门研究军人的思维问题，就成了军事思维学的任务；

数学的研究对象是现实世界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其任务是揭示这种关系和形式的规律，告诉人们如何对认识对象进行科学的定量分析。军事运筹学，是运用数学和计算技术对军事问题进行定量分析和筹划的学科；

系统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存在于一定环境之中的各种系统，其任务是揭示系统的结构、功能、原则和规律，告诉人们如何对研究对象进行系统的分析和处理。军事系统工程是系统工程在军事上的具体应用；

军事学术的研究对象是建军与作战问题，其任务是揭示建军、作战的客观规律，包括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军制学、军队指挥学等，用以指导人们正确运用这些规律去达到预定的军事目的；

军事技术的研究对象是军事科学技术，其任务是揭示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化规律，指导人们正确发展和运用各种武器装备，等等。

从上述学科的研究对象和所担负的任务来看，一方面，军事方法学确实同它们有某些程度不等的相互交叉之处。这种相互渗透、相互重叠的情况，是现代任何交叉学科都存在的、不可避免的正常现象。同时，由于任何科学理论都反映了一定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已有的科学理论可以作为进一步去认识和改造客观事物的工具，总是具有方法论的性质，因此这些相近学科的基本原理，自然就成了军事方法学总体或部分的理论基础。何况它们所提出和运用的各种科学方法，亦为军事方法学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但另一方面，军事方法学又明显不同于这些学科，军事方法学研究的对象

是军事活动的方式、途径、程序与手段，其任务是为人们认识与改造军事世界提供有效的科学方法武器，同哲学与军事哲学、思维学与军事思维学、数学与军事运筹学、系统科学与军事系统工程、军事学术、军事技术等研究的对象和任务有着严格的区别。因此既不能将军事方法学与各种相近学科割裂开，又不能把军事方法学与各种相近学科混为一谈。

第二节　　军事方法学的知识体系

明确了军事方法学的研究对象，及其同其它学科的联系和区别之后，看它能不能成为军事科学中一个独立学科的问题，还取决于军事方法学能否构成一个完整的科学知识体系。为此，就必须回答这样两个问题：一是科学军事方法如何构成分类体系，一是军事方法学如何形成整个知识体系。不解决这两个问题，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军事方法学存在和发展的科学依据。

(一)科学军事方法的分类体系

军事方法是军事实践与认识活动的各种方式、途径、程序和手段的统称。就像所有的方法并非都属科学的方法一样，也不是所有的军事方法都属于科学的军事方法，还有唯心的、经验的军事方法等。科学的军事方法，仅仅指那些遵循军事事物的本质联系和发展变化规律，依靠科学的工具和手段，去从事认识和改造军事世界活动的方法。

军事方法的名目、种类繁多。由于划分的原则和标准不同，可以将这些方法分成许多不同的类别。例如，根据方法的性质来分，可以分为认识军事世界的方法和改造军事世界的方法两大类：军事思想方法、军事观察方法、军事调研方法、军事逻辑方法、军事直觉方法、军事运筹方法、军事系统科学方法等均属于认识军事世界

的方法 军事领导方法、军事管理方法、军事教育方法、军事威慑方法、作战和指挥方法、后勤保障方法、军事训练方法、政治工作方法等均属于改造军事世界的方法。

根据方法的功能特点来分，可以分成军事原则方法和军事具体方法两种。军事原则方法包括军事历史方法和军事逻辑方法、军事系统结构方法和军事系统功能方法、军事定性方法和军事定量方法、军事内容分析方法和军事形式分析方法等。军事具体方法包括各种各样具体的军事活动方法，如从军事认识过程看有军事归纳方法、军事演绎方法、军事类比方法、军事直觉方法、军事信息方法、军事黑箱方法等等。

根据方法的应用领域来分，可以分成军事社会方法、军事政治方法、军事经济方法、军事历史方法、军事教育方法、军事心理方法、军事战略方法、战役战术方法、军事技术方法、军事预测方法、军事科研方法、军事决策方法,等等。

还有其它的分类样式，在此不一一列举。

不过有两点必须看到：第一，上述的分类并非十分严格，各种方法类型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因而具有一定的相对性；第二，上述的分类只注意了横的方面，忽视了方法的层次结构，因此缺乏体系的系统性和逻辑性。分类的相对性，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难免的，但增强方法体系的系统性和逻辑性，却是方法分类研究应该追求的目标。

那么，怎样构成科学军事方法的体系才比较合适呢？可以先根据方法的共性程度和适用范围分成几个层次，再根据方法的性质、功能和应用领域对各层次方法加以细分，从而构成既科学而又适用的体系。其中，第一个层次是军事总体性方法，或叫军事哲学方法、军事思想方法，其理论基础是哲学与军事哲学的基本原理，概括的对象是各种各样的军事方法，因此具有最普遍的性质，适用于军事实践与认识活动的一切领域。这种方法，反映了军事矛盾运动

的普遍联系和发展变化的普遍规律，旨在告诉人们如何从根本上、总体上、方向上去把握军事世界，去实现认识和改造军事世界的目的。

科学军事方法体系的第二个层次是军事方面性方法，包括有军事基础方法、军事思维方法和军事系统科学方法等。其特点是反映了军事世界某一方面的性质，可以广泛而又有限度地用于军事实践与认识活动的各个领域。它与军事总体方法的不同之处，在于不是反映军事矛盾运动一切方面的普遍规律，而仅仅是反映军事矛盾运动某方面或某几个方面的共同规律，因此只具有某种程度的普遍性。例如，军事基础方法乃是解决主体如何去接触、感知客观军事世界的方法，所包括的军事观察方法、军事试验方法和军事调研方法等却广泛适用；军事思维方法乃是解决主体如何达到思维的正确性、科学性和创造性的方法，但包括的军事逻辑方法、军事直觉方法、军事运筹方法和综合的军事思维方法等也广泛适用；军事系统科学方法乃是解决主体如何从系统的思想出发对军事事物进行正确分析和处理的方法，它包括的军事信息方法、军事反馈方法、军事黑箱方法、军事系统工程方法等同样广泛适用，等等。

科学军事方法体系的第三个层次是军事专门性方法，包括有反映某一专门军事领域规律和只适用该领域的军事专业方法，以及反映几个相关军事领域规律和适用于几个领域的军事门类方法，例如，军事学术研究方法、军事技术研制方法、作战方法、军事管理方法、军事预测方法、军事决策方法等，都属于跨学科和涉及好些领域的门类性军事方法；师对野战阵地防御之敌的进攻方法、团在坚固阵地的防御方法、后勤补给方法、思想工作方法、撰写军事论文的方法等，就属于比较单一的专业性军事方法。这类方法非常之多，举不胜举，可以说每认识一种军事现象，每做一项军事工作或处理一个军事问题，都会有相应的、具体的许多专门方法。

当然，这几个层次方法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共性程序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高、适用范围广的方法对下层次共性程序低、适用范围窄的方法具有指导作用。而任何适用性受到一定限制的方法，又程度不等地包含着科学军事方法共有的因素，正是从这些共性因素出发才能概括出一层比一层更具广泛性、普遍适用性的方法。

还有一个科学军事方法的运用问题，例如在军事预测、军事决策和军事科研等常见的军事活动中，如何综合运用科学方法实现预期目的等。对此，必须明确两层意思：一方面，科学军事方法体系和科学军事方法的运用，尽管都是军事方法学必须研究的内容，但方法体系和方法运用是有联系而又有区别的两回事，因此当讲到科学军事方法体系的分类构成时，可以不涉及科学军事方法的运用问题；另一方面，诸如军事预测、军事决策、军事科研或其它军事活动中所用到的方法，一般都包含两个部分内容，一部分系一般科学军事方法在活动中的具体运用，另一部分系这些活动本身的专有方法，而这些专有的方法其实就属于科学军事方法体系中第三个层次——专门性方法的内容。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军事活动的方法运用问题，又是科学军事方法体系中的重要部分。

（二）军事方法学的知识体系构成

军事方法学研究对象的确定，为其知识体系的建立规定了总的方向和范围。而科学军事方法分类体系的构成，又进一步为军事方法学知识体系的确立提供了直接的基础和条件。可以这样说，军事方法学的知识体系，既是关于科学军事方法共同本质、规律及其运用原则的系统构成，又是对科学军事方法体系及其各个层次的理论阐明。

军事方法学的科学知识体系，在本书主要由以下三个部分构成：

关于军事方法学的基本原理部分。我们首先从明确军事方法学的研究对象和科学内涵出发，着力阐明军事方法学的科学知识

体系，并回顾这门学科的历史形成过程，指出当前学习和研究这门新学科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然后，就科学军事方法结构的基本要素：主体要素、客体要素和媒介要素等，分别和相互联系地进行分析研究，找出科学军事方法内部的基本矛盾和基本联系，揭示科学军事方法的真正本质及其主要特性。接着，专门探讨了科学军事方法的基本规律，如军事方法的客观存在规律、军事方法的不断革新规律、军事方法的优化选择规律和军事方法的综合运用规律，等等。显然，本质是规律的基础，规律是本质在运动状态下的具体表现。因此，关于科学军事方法规律的论述，实际上是对其本质阐述的继续和延伸。有关科学军事方法的本质和规律问题，尽管是军事方法学基本原理中的核心内容，但如果不首先明确其对象及其结构状况,这个核心问题就会失之于无的放矢,而得不到解决。因此，不能把基本原理的核心部分理解为基本原理的全部，而应由上述各方面内容有机构成科学军事方法的基本原理，共同作为军事方法学知识体系的理论基石。

关于普适性科学军事方法论部分。我们分析研究了具有普适性的四种主要的方法论，可说是对军事方法学基本原理的进一步发挥和具体化，是在理论基石上建起的军事方法学上层建筑的主要框架。其中，军事总体方法论是对科学军事方法体系中第一个层次——军事总体性方法的理论阐明，它从根本上揭示了军事活动的内在联系和外部联系，着重探讨了军事矛盾运动的动力、基础、条件、形式和规律，从而找到了进行一切军事活动都应该遵循的科学军事观、基本程序和方法原则。接着，介绍了科学军事方法的第二个层次——方面性军事方法,主要是对军事基础方法、军事思维方法、军事系统科学方法的理论阐明。其中，军事基础方法极为繁多、丰富，不可能一一涉及，仅就对军事实践和认识活动联系最紧密、最常用到的军事观察方法、军事试验方法和军事调研方法分别作了概略探讨，从而为人们提供了一把如何接触和感知客观的军

事现象、事件与过程的钥匙；军事思维方法论主要是介绍军事逻辑方法、军事直觉方法、军事运筹方法和综合的军事思维方法等科学思维方法的性质、作用、理论基础及其运用特点，从而为人们提供了如何研究和概括经验材料，由感性认识达到理性认识的工具；军事系统科学方法论主要阐述这种方法的性质、作用和理论基础，着重介绍了军事信息方法、军事反馈方法、军事黑箱方法、军事系统工程方法等的特点和适用范围。所介绍的上述四种主要方法论，虽然各有具体研究的对象、内容和重点，但它们之间有着十分严密的逻辑关系。

关于科学军事方法的运用理论部分。如果说普适性军事方法论构成了军事方法学上层建筑的主要框架的话，那么同军事活动实际相结合的方法运用，就是为这个框架填充丰富的、生动的内容。本来，在军事实践与认识活动的一切领域都有一个方法运用问题，但我们没有也不可能一一去展开论述，仅仅挑选了军事预测、军事决策和军事科研等几项常见的、带普遍性和代表性的活动，就这些活动的方法运用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探讨研究。这里面，一方面要说明各种普适性方法如何具体运用的问题，另一方面又要对科学军事方法体系的第三个层次——专门性方法中的几种门类方法加以介绍和阐述。其中，军事预测的方法运用问题，主要分析了军事预测在军事认识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着重介绍了进行军事预测的专门方法和一般程序，目的使人懂得搞好预测的重要意义和如何去搞好军事预测工作。除了军事预测的专门方法，其它科学军事方法在预测中的具体运用，主要综合反映在军事预测的一般程序与步骤上。军事决策的方法运用问题，主要从军事决策在实践活动的特有地位和作用出发，着重研究了用于军事决策的各种专门方法，以及在军事决策过程中综合运用各种科学军事方法的问题，从而使人们知道通过哪些程序和步骤才能实现科学决策，才能转化为实际行动去达到预期的军事目的。军事科研的方法运用问题，

主要在阐明军事科研在军事实践与认识活动中的特殊地位与所起的特殊作用的基础上，着重就其自身专有的方法和其它科学军事方法的综合运用，分别作了分析研究，从而使人能把握住军事科研活动的规律，懂得如何进行军事科研并获得有科学价值的成果。

第三节　　军事方法观念的发展历程

军事方法学作为一门新的军事学科，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或由谁臆想出来的，它有自身萌芽、生长和形成的历史发展过程。自从人类社会出现了战争和军队，开始萌发军事方法的观念以后，各种军事方法伴随着军事实践与认识活动的演变、发展而演变、发展，才逐渐形成了今天的军事方法学雏形。毫无疑问，它将随着整个军事领域的不断变革，发展成为一门完全成熟的军事学科。

(一)古代的军事方法观念

军事方法观念是随着战争等军事活动的出现而开始萌芽的。即使最原始的战争，当人们为了争夺猎物、牧场、居住地而进行对抗，拿起手中狩猎或耕种的石、木工具去进攻对方的时候，已不能不面对着如何改进、使用工具和怎样去厮杀才最有效的方法问题。后来出现了专门的军队，战争等军事活动真正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之后，情况就更是如此。只不过，在那种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人的思维、认识能力十分有限的条件下，古代的军事方法观念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形态：一种是求助神灵的唯心主义军事方法观，一种是简单、朴素的经验型军事方法观。

求助神灵的唯心主义军事方法观，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的古代战争活动中，一直比较盛行。其主要特点就是信仰和崇拜神灵，先是希望借助某些超人的自然物和部族祖先来保护自己，出现了诸如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灵魂崇拜，后来又发展到依靠人格化的

神，认为战争等各种社会活动皆不过是神的安排，战争的命运全由神灵左右。那时采取的具体方法，除各种巫术和妖术外，主要采取占卜、求签的方式求取‘神谕’‘仙示’，来决定有关战争的重大问题。据历史记载，古时占卜、求签的形式很多，例如中国古代多用火灼龟壳、兽骨观其裂纹的形状，或者到祠堂、寺庙占卦、求签，来预言吉凶祸福，决定一件事情该不该办或该怎么样去办；其它一些古代国家，多用晶球、纸牌之类的东西进行占卜。还有一种占星术，是以观察星辰运转的变化来预测事物的方术，一度亦相当流行。古埃及、古希腊等国，甚至设有专门的神庙和神职人员，制定了一套严格的占卜制度和程序，依靠‘神谕’‘神旨’来决定各种重大问题，自然也包括是否兴师、征伐和预示其胜败结果等方面。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常用到的“特尔斐”预测与决策方法，就是得名于古希腊信神中心特尔斐，传说从这座古城中供奉的阿波罗神那里获得的“神谕”最灵验，因而现代人借用此意来说明‘特尔斐法’的优越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这种种充满宗教迷信色彩的观察、预测和决策等方法，在古籍和战史记载中都有一定的反映。例如，古埃及的《孟斐斯神学》、苏美尔史诗《吉尔伽美什与阿伽》、古中国的《山海经》、古印度的《梨俱吠陀》和古希腊的《荷马史诗》等，分别对古代埃及、西亚、中国、印度、希腊的‘神战’传说情况，作了生动而具体的描述。尤其是中国的许多古代典籍，甚至将这些东西加以理论化，使卜签形式与哲学思考合为一体。《周易》就是其中一部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它一方面带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萌芽，但另一方面主要由卦、爻两种符号和卦辞、爻辞两种文字构成，共 64 卦，384 爻，都是为占卜用的，通过占卜的不同结果，来说明和预测战争等社会生活现象的安危、吉凶和应采取的行动。此后，汉代时流行的‘谶纬学’，可说是宗教迷信方法观的进一步发展。“谶”，是巫师或方士制作的一种隐语或预言，作为吉凶的符验或征兆。所谓‘纬’，是对‘经’而言，系方士化的

儒生编纂起来附会儒家经典的各种著作。“谶纬学”主要把自然界的某些偶然现象神秘化，加上神化的儒学，用这些东西来说明和预测社会生活的安危、起落。另外，在一些军事历史资料中，还经常可以看到人们通过运用各种各样的“谶语”，或者是看相、释梦之类的办法，来决定自己行动的记载。

中世纪的欧洲与西亚地区，由于宗教成了思想文化领域的垄断者，在基督教的十字军东征和伊斯兰教封建帝国发动的各次战争中，“神”作为决定一切的主宰，更使得求助神灵的军事方法观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直到现代，求助神灵的军事方法观在一些国家的军队或军人身上，仍可看到某种遗迹遗风。那些尚处于愚昧落后状态的氏族、部落姑且不论，就是在一些武器装备非常先进的国家军队里仍然设有随军牧师，而且看相、算命的更不乏其人，有的甚至发展到用电子计算机为这类宗教迷信披上科学的外衣。

简单的、朴素的经验型军事方法观，则是一种与求助神灵的唯心主义军事方法观相对立古代军事方法观。一方面，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的需要，促使观察方法、逻辑方法和实验方法得到了相应的发展，例如，古代欧洲与中国的天文史就是一部观测天象史，亚里士多德创立了形式逻辑体系，罗吉尔·培根提出了“实验科学”的各种方法，等等，人们很自然地把这些行之有效的方法用于军事活动；另一方面，战争是严酷无情的，求助神灵的方法在军事实践中经常证明是不可靠的，有时虽偶尔取得了某种成功，但更多的情况下只能屡遭失败。惨痛的教训，使一些指挥员、士兵和军事理论家，开始像面对生产、生活那样面对军事活动的实际，来考虑和决定问题。他们凭着自己的感官和亲身经验，或者是根据别人手把手传授的经验知识，来指导各种各样的军事实践与认识活动。例如看到石器、铜制工具能够杀伤野兽，就想到可以移作兵器用于战争，并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缓慢而不停顿地改进着这些兵器；十八般武艺和各种队形、阵法，都是多少人通过多少次战争，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